

第肆章 中共「大國外交」政策的影響

第一節 對經濟發展的機遇與限制

中共外交的核心內容已經逐漸成形。國家利益發展的主要前提，就是必須有一個和平穩定的外交情勢。¹當務之急是要確保中共政權的穩定。²在追求發展，提升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目標下，社會的穩定是非常需要的，並且更加需求外交關係上的穩固，如此經濟才能有更進一步的發展，相輔相成下，國家的利益便會持續擴大，經濟的發展也會持續地成長，並保障人民的生活，中共政權的合法性與穩固也才能延續下去。

一、維持與他國間的往來是尋求穩定的基本要務

中共在六四事件之後，普遍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並且展開一連串對中共的經濟制裁，這些國家絕大多數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經濟大國。而這阻礙了中共在經濟上的發展，並且促成當時國內經濟的停滯與萎縮。因此想要突破這項困境的首要方式，就是不主動對西方等經濟大國採取報復手段，加以逐步化解這項危機，³鄧小平所指導的二十八字方針⁴也適時達到預期的效果。

蘇聯以及東歐各共黨國家在 1989-1991 年之間陸續瓦解。在這個時期，中共內部極左的勢力主張要力抵西方國家，並且以強硬的態度去解決和西方政經大國的一切爭端。否則中國亦會步入蘇聯的後塵；在此期間江澤民必需面對下列主要幾點：

(一)、經濟利益是鞏固政權的主要方法。中共必須以充沛的財政維持社會主義基本的要求。以經濟利益的增加，解決財政的困難，強化社會主義的福利功能，解決下崗工人的問題，減少中國因失業所造成的動盪。在這樣的前提下，才能合理化「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政權合法性，以此作為穩定國內政治與中共政權的可能。

¹ 人民日報，1998年8月29日，版1。「江澤民於北京接見中共使節團會議代表時強調：我國對外工作的首要任務是爭取和平，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² Denny Roy,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p.42.

³ 中共學者程林勝堅信美國對中(共)國政策，將不會因天安門事件而持續其經濟制裁，認為其政策將會擺回至「向現實主義方面傾斜」，其理由在「美國需要對華政策的連續性、美國不主張孤立中共及美中(共)貿易對雙方都有利」。

⁴ 鄧小平，「善意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頁350-352。

因此，中共政權存在的最大價值就在於，立基在社會主義體制上，政府必須體現保障人民生活的政策。所以廣大的財政支出在社會主義國家的設計上遠多於資本主義國家。對於中共第三代之後的領導者而言，毛澤東和鄧小平具有獨裁的領袖魅力，並且以掀起強烈的民族意識以及對國民黨政府和其他資本主義大國的不滿情緒轉化為政權合法性的來源。但是此後的領導者卻必須在 1989 至 1991 年間的歐洲等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倒台的情勢下，吃力的向人民解釋「只有中國可以才可以救社會主義」的可能，加強內部的意識型態，這樣中共領導才得以正當化。

中共的中央財政在 1998 年起已為社會福利支出 876.27 億元，較 1999 年增加了三分之一。財政部長項懷誠在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指出中央財政將繼續增加社會福利方面的預算。⁵

朱鎔基在 2000 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到，完善社會福利制度將是中國今後五年的首要任務。每次的五年計畫都會有一個目標，儘管達到的成效不見得顯而易見。但是，此次會議中卻將它單獨列項。這不僅表示中共計畫經濟的成效不彰，更重要的，也影響到中國經濟的發展，從而影響社會主義在中國大陸人民心中的正當性，更深刻地影響到政權。

人大代表薄熙來更感觸地說：「完不成這項任務，經濟結構調整就無法進行，改革開放也無法更有所作為」；這充分的顯示出中共理解到人民經濟生活的重要性，甚至會影響到國本。例如，隨著大陸國有企業改革和結構調整的加快，中共國有企業職工總數已從七千萬減至五千萬以下。2000 年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增加到 3.1%。雖然中共計畫未來五年內會將這一指標控制在 5% 左右，但是為應付大量的失業人口，完全由政府和企业負擔的局面必須儘快改變，因此加快完善社會福利體制成為今年最迫切的一項經濟目標。也唯有加緊建立健全的社會福利體系，以為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同時降低市場經濟中人才流動的社會成本。

所以，中共必須加緊維護經濟的成長與穩定，避免重蹈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因為經濟萎縮乃至於失去政權的歷史教訓。因此，除了意識型態的鞏固之外，提升綜合國力、保

障國內民生計，更是向外拓展的本錢與條件。

(二)、與大國結交是屬於社會主義計畫經濟權變的作為。社會主義是屬於計畫性的經濟模式，並不因供需法則來變動產品或企業的增長或淘汰，與資本主義強調以自由經濟市場來決定企業的增長或淘汰，存在結構性的不同；因此，兩種不同屬性與制度的經濟體要能夠相互交流，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無法理解不以供需法則調整的僵化市場，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無法接受持續變動而且淘汰率極高的資本主義國家。

在矛盾的性質下，必須建立政策的配合。因此，中共逐漸認知到，自身的未來發展必須是建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再以經濟發展來帶動的政治發展、軍事發展等，而這些發展必須立基於和國際市場交流之上，中國才得以延續發展。因此，外交政策必須減少對資本主義國家與周邊國家的敵對，才是參與國際經濟的鑰匙。

故從 90 年代開始，中共除了謀求經貿關係的多極化，揚棄從前的雙邊關係，逐年加重周邊國家的貿易比重，以期強化自身的國力，尤其是地方經濟實力以及生活水平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周邊國家多是開發中國家，對口貿易的金額會因發展的快速，有著更加乘的效果。這都代表著中共原本僵化的外交模式逐漸轉變當中，而不會因為政治方式的不同有所區隔。這代表著中共逐漸提升的「大國」地位。但是假若沒有周邊國家的認同，大國的地位必定是不存在的，並且在國際社會上也不見得能和西方各政經大國有平等的機會，更不用說能在這些政經大國中獲得更多的經濟機會，以及穩定的發言權。如此便能穩固中共政權，不為他國的質疑或是把持任何干涉內政的可能。

但是，在經貿夥伴關係上，中共並不以蘇聯或是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為主，往來的對象反倒是以民主及資本主義著稱的西方各政經大國作為經濟的貿易夥伴。就經貿的領域而言，中共認為經貿必須和資金充沛的國家往來，才能獲得成效。因此與俄羅斯的往來只能是看作是與前共黨國家外交關係上的延續。實質上，俄羅斯等前共黨國家所佔的貿易額，雖然在六四事件之後，增加幾個百分比，但以西方各政經大國的貿易比重來看，仍然算不上密切。

在鄧小平領導的後期，中共與西方政經大國交往的密切程度，完整的顯示在貿易數

5 蔡敏、黃燕，「中國加緊編織世界最大的社會保障網」，中國宏觀經濟資訊網，2001 年 04 月 29 日。

額上。以 1998 年為例，中共與已開發國家貿易額占 53.67%，台灣占 6.3%，港澳占 14.3%，總共是 74.27%。⁶從這些數據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中共貿易的選擇對象，並非以第三世界國家、前共黨國家為主，取而代之的是給予中共最大的經濟利益的西方資本國家。因此，儘管基於社會主義的立場，中共為因應如此情勢也必定要做出制度上的妥協。

例如中國早已是全球化下的受益者，全球化包括貿易自由化、FDI（外商直接投資）、短期資本流動和知識的傳播等。中共在這方面受惠最大的部分就是 FDI（外商直接投資）⁷，雖然中共在改革開放中仍然維持著一定的匯率，但是在 2005 年 7 月也終於做了微幅的調整，而這正代表著中共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正逐步隨著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有所變動。主要也是因為國際社會不可能僅讓中共獲得外商直接投資的利益，卻沒有受到該有的回饋。

事實上，中共為了要獲得與其他世界經濟大國往來的廣大經濟利益，必須改變社會主義的經濟原則，也唯有增強與維繫世界的經濟關係，才是國際關係構聯的基礎。⁸所以，中共在社會主義計畫性經濟上的堅持已經逐步為了獲得西方經濟大國的支持，而有所鬆動。雖然，中國內部產生不小的聲音，包含中共內部左派的反彈以及對社會主義理論的質疑。但就目前看來，中共的領導者必須為了國民經濟與發展，以及中共政權領導的順遂，這不過是個權宜之計。

三、與西方各國獲取經濟利益的現況

務實是中共對於意識型態不同國家交往的原則，卻也容易遭致國內不同的反對與阻力。⁹因此中共與世界各國的往來，必須小心處理不同政治理念國家間的外交與貿易，尤其是強化對外貿易，就足以違背了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理想。但是理想的維護必須考量經濟的現實。而就中國現有的國有企業以及社會福利制度，財政收入確實難以支撐。但是對中共內部左傾的保守派而言，與西方政經大國往來，就等於是靠攏資本主義，嚴

6 許志嘉，**當代中共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頁 87。

7 斯蒂格利茨，「中國發展新經濟面臨兩難」，**中國宏觀經濟資訊網**，2001 年 04 月 29 日。

8 余起芬等編，**國際戰略論**，頁 133。

9 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卷一，頁 295。

重的違背了共產主義及毛澤東思想，將會導致共產黨的敗亡。

然而，中共在鄧小平務實的名義下，盡量避開與民主或是人權相關等議題，單就經濟發展作為一切的出發點，利用世界各國間的矛盾謀取外交利益與經濟利益，必要時以政策和實質面作取捨。以與日本的經濟往來為例，面對著歷史的仇怨和政治與利益的交換，中共甘願背上賣國政府的名號，也不願與日本交惡，體現了所謂的「務實」。

(一)、對美國的經濟往來現況。美國是中共第一大貿易夥伴，每年有二百多億的貿易順差，尤其中共所獲得的技術移轉，多半是經由美國而來。需多的企業和國內的就業機會必須仰賴美商投資。雖然在「六四」事件之後，美國帶頭掀起抵制與制裁的經濟措施，對中國的經濟發展造成不小的衝擊。但是，中共除了以聲明嚴厲譴責美國的作為，但實質上，中共對美國的外交態度上，仍是採取低姿態加以面對。

但是，論及藉由國際間的矛盾獲取利益時，中共以完全不同的態度面對，例如身為聯合國安理會以及常任理事國，在美國於 1991 年急迫以聯合國的名義下出兵伊拉克的情勢下，中共即主動與美國聯繫。在不違背中共外交的「和平共處五原則」下，於安理會中以「棄權」的方式默許美國出兵，而條件是要求美國重新檢視制裁中共的行為，重開部長級之間的對談。因此，在一年多的時間內，逐步化解了以美國為首的經濟制裁。

其次就是在 1991 年之後，逐步釋放「六四」事件的民運份子，例如方勵之夫婦以及魏京生等重要「民運人士」。而這都是中共要求美國有所回饋之後的交換條件。而其中最為重大的影響就是在 1994 年美國總統柯林頓宣布「最惠國待遇與人權議題的脫鉤」。不過，面對中國利用矛盾以及仿冒商品獲益，影響美國利益的狀況下，美國特別祭出了「特別 301 條款」以及「反傾銷」的措施，對中國的出口商品實施懲罰性的制裁。

另外，在美國以市場和協定條約的限制下，中共為了要加入「關貿總協定」，也於外貿體制、關稅以及市場經濟體系等攸關保護政策上做出重大的讓步和承諾。但是，這方面的犧牲也換得和美國之間的正常貿易關係。中共更藉由美商企業的關係與力量，獲得美國政府在外交上賦予的優惠。

(二)、對日本的經濟往來現況。日本是中共第二大貿易夥伴，1980 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過程中，資金、設備的投資以及科技移轉主要來自於日本。而中國初期的對外貿

易也以日本為銷售對象。從鄧小平時期開始，中共領導人一直持著「親日」的外交格局，一切以爭取貿易輸出的利益為目的。甚至在日本侵華的歷史問題上，也是儘量以低調的語氣評論。甚至被當時的大學生諷為「賣國政府」。

但是，到了江澤民主政時期，中共開始利用日本侵華歷史「逼迫」日本讓步至所設定的外交框架內。例如在 1995 年 8 月，中共進行核試驗，正值日本紀念廣島原子彈爆炸五十週年。日本向中共政府提出了強烈抗議，並且決定削減對中國大陸的經濟援助。8 月 31 日中共外交部對日本政府凍結經濟援助一事表達「深表遺憾」，並且糾正日本應該為侵華的罪行深刻檢討。而李鵬、錢其琛等外交官員於公開場合對國際社會批判此事。日本在輿論的壓力下，於 11 月份簽署了一筆等值 14 億美元價值的日圓貸款。中共以為歷史翻供的方式，要求日本在經濟上作出讓步。然而中共深知日本對中國大陸的依賴遠低於中共對日本。因此，中共採取間歇式的態度，不加諸過當的壓力使得日本反彈。並且在面對國內民族主義意識的高漲時，只為安撫民眾而稍稍帶過相關的譴責，仍舊對日本採取友好的外交原則以爭取更多的經濟利益。

(三)、對俄羅斯經濟交往中經濟利益獲取的現況。在毛澤東時期，鄧小平曾主持「九評」文章，嚴厲批評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領導的蘇聯共產黨所實施修正主義。但是等到鄧小平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時，卻也開始實施改革開放。而布里茲涅夫便指責中共是背叛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爾後，蘇聯新任總書記戈巴契夫上台也提出了所謂的「新思維」，此時的中共又大力撻伐認為蘇共的「民主社會主義」在本質上就是資本主義。在意識型態對立下，再加上長達 20 多年中蘇邊境的軍事對峙，雙方很難在短時期內達成某些共識。

江澤民主政後，為因應戈巴契夫將「反『和平演變』」作為外交工作的首要目標，並一度轉向意識型態外交。但外交部長錢其琛認為外交應以「實際利益」為基準，而且採行資本主義的俄羅斯將帶給中國更多的好處。

中共前總理李鵬於 1995 年訪俄，這也正是中共與俄羅斯的關係進入 60 年來的顛峰時期，並正式走向新的夥伴關係。在經濟上，中共與俄國之間存在著經濟的互補性，主要是中共改革開放後以輕工業為主，重工業及科技卻相對落後。而俄羅斯的技術發

達，但初級產業無以滿足國內需求。對中國而言，發展正需要俄國現有的能源設備、技術。而中國相對進步的農業科技有助於俄羅斯的農業落後狀況，並且也為過剩的輕工業產品找到市場。

不過，這都是起步的階段，以物易物的交易還是佔有較大的比重，市場並沒有足夠的規模來滿足需求，但藉由相互廣大的市場賦予了更多的發展潛力。然而，一旦俄羅斯擺脫了目前的經濟困境，並與北約等國家之間保持穩定成長的經濟交流時，與中共的夥伴關係是否會被加以取代還需要更深入的觀察。

(四)、與歐盟等大國經濟往來的現況。「六四」事件之後，近一年多的時間，中共為了解決以美國為主的經濟制裁帶來的負面效應，於是轉向逐漸成長的歐盟尋求其他可能。歐盟的地位因為冷戰消失而逐漸升高，其會員國擴大到 15 國，經濟與軍事的整合也逐漸成形，遂成為中共外交的重點。而這是中共尋求美國經濟制裁下的其他出路。而近來，歐盟也將眼光開始注意到中國大陸廣大的市場潛力，在雙方互有所求的狀況下，經濟關係迅速發展並日益密切。

歐盟與中共的貿易額在 1995 年已達 400 億美元，到了 1996 年，歐盟在中國大陸的市場佔有已達 13.5%。中國成為歐盟的第四大出口國，而歐盟也是中共的第三大貿易夥伴。技術移轉方面，中共是歐盟最大的技術設備輸出國，轉讓技術達 3000 多項，涉及金額高達 156 億美元。歐盟在 1996 年於中國各地開設了近 3500 家的企業，對中共而言，這是極大的經濟成就。

在歐盟當中，中共最為重視與德國間的往來。因為德國面對中共的人權問題向來是不予過問的。而當 1995 年初歐盟對中共紡織品、玩具等商品出口單邊設限，德國卻公開批評這樣的作法失當，更顯示德國的友好態度。這段期間，中共與德國不僅領導人及部長級的官員頻繁的往來訪問，德國也成為中共在歐洲的最大貿易夥伴。例如 1994 年李鵬訪問德國時，便簽下了一筆近 31 億美元的交易契約。

然而，歐盟之中也有對中共不甚友好的國家，例如法國。他是歐盟之中最嚴厲批評「六四」事件的國家，不但接納了大批的海外流亡民運人士，甚至政府官員和總統夫人也親自出席民運組織的會議，並且同時出售高精密的武器裝備給中華民國。但是，德國

等歐盟邦交國紛紛搶佔中國這個市場的同時，為求利益，法國也只好在 1993 年，與中共修補雙邊關係。直至 1994 年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訪問法國時，才恢復原有的關係。

而與英國的經貿關係中，由於香港回歸大陸的議題，造成彼此的不愉快。但總體而言，英國與中共的關係介於德國與法國之間，並且中共也認為只要香港問題能獲解決，與英國之間的經貿關係必定順遂。

四、小結

總歸中共希望藉由外交的手段，獲取得經濟上的利益。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以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取代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理想，並且無論他國的態度為何，總是放低身段，利用矛盾來獲取自身最大的利益。而這幾年的經濟成長也證明了中共在外交手段上的成功，並且正邁向成為一個經濟大國的契機。但是，開放經貿之後，隨著自由經濟體系的導入，也成為中共當政者的憂慮。經濟的成長是否會讓中共政權更加穩定也必須視執政的成效而定。

第二節 中共大國外交對軍事戰略的影響

一、軍事戰略是中共在大國外交上爭取地位的首要策略

中共很期待國際外交體系自發成為多極體系。但是在冷戰結束後，以綜合國力的評估而言，中共仍然無法取代前蘇聯成為一強與他國共同享有政治、經濟、軍事多極鼎立的國際體系。而以政治或經濟或兩者兼具的大國，例如英、法、德等歐盟組成的政治大國、日本的強勢經濟等，目前仍無法與美國匹敵，而形成現有的一超多強。美國雖自居世界警察的地位，卻沒有平等對待各民族及國家，這和中共所提倡的「和平共處五原則」是背道而馳的。

中共認為各國外交採取的是競合的策略。在合作的層面上，先佔最有利的地位。除了經濟與科技的優勢外，軍事力量更是必須的，並且經濟與科技的發展，也會轉移到軍事的發展上面。軍事實力的大小是國與國之間往來與交惡的重要因素。無論平、戰時期，軍事實力是展現大國力量最好的指標，也是憑仗的後盾與保障，所謂「弱國無外交」，指的強弱之別就是軍事力量的能耐。外交的順遂常常需要軍事實力作為後盾。因此，國力與軍事實力的是相輔相成的。

因此軍事戰略的優劣會深刻的影響經濟與科技的發展，所以「和平時期的軍事力量發展，在通常情況下需要服務於經濟、科技力的發展」¹⁰正是中共的策略。而軍事戰略的優勢不僅止於軍備的力量上，必須著眼於國際間的戰略關係與軍力的相結合。若是一昧的擴展軍備力量，反倒會對經濟上造成嚴重的傷害，並且破壞到國家其他的面向。例如，軍備的擴張會相對壓縮到教育、社會福利、經濟建設等公共預算。

軍事戰略必須有助於外交的推動。若僅以軍事強國為目的，並不見得在國際上會造成正面影響。因為軍事力量的目的就是以武力加諸於他國之上，然而軍事力量的強度雖然會對他國的外交造成實質的影響，但多屬於武力的威脅，所以軍事力量主要在於以能威懾他國，穩定國家安全，壓抑國內反對勢力等目的。在國際之間，軍事力量代表著有利的發言權，也對外經濟利益的拓展的重要根基。

但是軍事力量不僅需要擴張軍備，舉凡任何策略上的運用以達成主要目的動作都

可以涵蓋在戰略作為之下。中共為了要爭取國際間制高點的地位，在與他國之間的談判，也曾使用過許多「以退為進」的戰略。在東海主權的爭議上，中共主張擱置海外領土的爭端，並共同開發海外爭議地區資源，避免與爭端國擴大爭議，但以收回主權為最終目標。例如，在南沙群島的問題中，中共主動提出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但也從未放棄日後取回南沙群島的主權。所以，中共還是在各式公開場合上主張擁有南沙群島及釣魚台的領土主權，並加強海軍戰力，以增強維護主權的能力。

二、軍事戰略在中共的大國外交上是自身安全的重要保障

國家利益的體現都必須建立在安全的國際關係上。尤其在經歷蘇聯倒台的過程中，社會主義國家面臨重大挫敗。這使得中共瞭解到必須以綜合國力的增強才得以鞏固現有的國家利益，而其中包括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邊疆地區和國內其他地區的穩定、實現祖國統一等基本的國家安全目標。

同時，維護國家安全不僅是國家利益的基礎，也是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因此，發展軍事能力，提升戰略地位更是中共確保生存的重要方式。但中共最終追求的不是單純的軍事戰略利益，是需要商權的。因為一個國家提升軍備的動機，常常不是為國家利益而建立的前提，而中共目前的軍事戰略主要是在追求多餘的武力作為他國的威脅，並非是對國家最有利的行為。

安全利益的首要目標是足以抵禦外敵的入侵，並且預防、制止和擊退對中國大陸下轄領土的軍事行動。這也就是中共在處理台灣問題、邊疆問題上的態度。中共認定這些都是國內的事務，涉及主權問題，所以不容其他國家侵犯與干涉，而這也正是中共持續發展軍備的主要理由。

第三節 對國際體系建構的影響

在冷戰結束後，由於蘇聯的垮台，俄羅斯正處於急迫的經濟轉型。因此中共面臨北面大規模入侵威脅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並且在可預見的未來內，中國捲入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不大。中共軍事力量的發展已足以抵抗他國為脅，並且美國、俄羅斯、日本等大國也預期未能對中共造成直接的軍事威脅及發動大規模軍事入侵。中共認為其所追求的和平與安全的國際環境是可期的，並藉由自己的軍事能力遏止住周邊的國家可能以武力來侵犯主權的行為，包括中越、中印之間的領土及領海問題，以維護國家安全利益。但以長期來看，中國安全態勢並不趨於穩定，反而增加了諸多變數。

首先是國際戰略力量的失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在冷戰後加快國防的轉型以及全球軍事部署。在兩極對立消失的情況下，國際之間戰略力量的重新部署，並未促成他國的公開反對或質疑。俄羅斯因經濟衰退並在援助上需求西方國家的資助，因此對美的戰略進行重大調整。俄美關係迅速升溫，對美國單方面宣佈退出《反導條約》的反應“相當克制”。這樣局勢促成中共成為美國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

其二是中共認為美國持續對中國的包圍，影響到世界的和平，並對中共造成潛在的威脅。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國家，由東西兩面對中共形成包圍，並加強與南亞和東南亞各國的往來與軍事協助上，達到所謂的「軟存在」(Soft Existence)，構成三面戰略威懾的態勢。而北約組織在蘇聯倒台後，其新加入的會員國使北約的地理觸角伸入到中亞和蒙古，對中共的西部戰略安全構成壓力。在「911」事件後，美國利用阿富汗戰爭擴大了對於南亞的控制。在西太平洋，美日的聯盟與北約構成一股包圍勢力。同時，美國加入東協的動作涉入了東南亞，更對中共形成戰略上的威懾。概言之，美國從東西兩翼對中共形成擠壓之勢，為中國的周邊地緣戰略注入新的變數。美國將中共視為亞太地區首要戰略對手的想法在可預見的未來應不會有所改變，而這將成為未來可能的態勢。

其三，中國的周邊安全目前正處於變數極大的狀況。中國現與 15 個國家接壤，近 18000 多公里的海岸線。這些周邊國家的狀況不斷，包括領土爭奪、宗教衝突、毒品走私、恐怖主義頻頻爆發，多數也擁有核子武器。然而，特別的是，日本藉由「911」事件打破了對外派兵的限制，由守轉攻。由於美國的積極介入，印度的軍事力量也持續增

加，南亞戰略力量出現擴大失衡的狀態。概括來說，中共目前周邊的情勢：北部相對穩定，東南憂患增多，東北、西南暗藏危機，南部變數持續增加。

其四，因為台獨勢力益發壯大，臺灣問題的變數也正增加當中。但是，臺灣難以突破國際上的孤立狀態，並且和中國在經濟和社會的往來日益深化。但是一意孤行的台獨勢力的擴展使得臺灣與大陸的關係「漸行漸遠」。目前臺灣政府逐步推行「去中國化」(De-sinicization) 的策略，使得中共的疑懼更為加深。

其五，「藏獨」和「疆獨」在國際間不斷爭取同情和援助。而中共當局認為勢必帶來分裂國土與影響邊界領土的威脅。新疆、西藏的獨立運動者也企圖與國外利益團體或國家串謀，以自治的主張圖謀國土分離。

其六，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日益嚴重。近年來，組織性的國際犯罪、恐怖主義、走私、販毒、及非法移民等相關問題也對中國產生逐漸的影響。在面對非傳統安全威脅方面，中共與國際上的合作機制尚處於完善之中。

基於上述的理由，中共在冷戰後必須面對的威脅與挑戰，除了增強軍事戰略的地位，也必須在重要性不斷提升的亞太位置當中維繫在亞太地緣戰略的中心地位。為因應國家安全、國際安全的變化，世界對中國角色的認知也有所變化。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中國的安全戰略思想也悄然改變。思想上的彈性和實踐上的創舉，是中國安全戰略在下一個世紀的基本優勢。中國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為基礎的安全觀，並建立以信任為基礎的安全模式，主導上海合作組織的創立。中國不管在安全利益的思考或是安全戰略的謀劃方面是與時俱進的。

中國安全利益的核心主要是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和平穩定的國際安全環境。中國的安全利益，應首先以陸上邊界的和平與穩定（包括與俄羅斯、中亞諸國、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等）為戰略依託；其次，在海域疆界上，與他國建立合作關係，確保東北亞的和平，並穩定中日關係，加強與東南亞的戰略合作，並以經濟的往來作為合作的基礎，積極推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改善中國的戰略環境。

其次，軍事手段仍然是保障國家安全的最後憑藉。中國必須推動軍事革新，以及積極規劃防禦的軍事戰略，堅持質量建軍，以備未來高科技的局部戰爭。為此，中國必須

建立可靠的核子威懾力量，並加速常規武裝力量的現代化，以質的方向發展，取代原本的數量優勢。

其三，反獨促統，維護國土完整。中國統一問題的處理是基本的國家戰略利益。臺灣是中國的領土，解決臺灣問題，一方面是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的最後任務，也是關係到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的戰略問題。中國應以政治、經濟、文化等方式促成共識，並以軍事的壓力減低台獨的可能，以最小的成本完成國家統一。首先應促進兩岸交流、維護和達成一個中國的共識，並藉由“統派”力量抑制台獨勢力的發展，創造統一的可能。同時整軍經武，不放棄軍事手段。謹慎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打擊“疆獨”、“藏獨”，防止新疆、西藏等地區有任何形式的分裂。目前，中國與少數周邊國家存在邊界上的爭議。這些邊界問題涉及中國的領土完整，所以必須在公平合理的基礎上加以解決。同時，不受他國利用邊界問題挑撥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進而介入中國內政。

其四，推動多邊安全合作，拓展中國的安全利益。一個國家的安全利益取決於該國的軍事實力及其與國際往來的程度，而國家安全利益的擴展必然反映在經濟利益擴張上。隨著中國對外往來的擴大，中國的安全利益必然相對擴展。但為能建立更加穩定的亞太安全機制，中國應積極推動多邊安全合作，參與並主導構建周邊安全機制，營造國際安全體系。

儘管，為了爭取更多安全保障，中共對軍備以及戰略優勢的追求，還可視為對非友善國家的軍備競賽。因中共目前是少數採行社會主義的國家，勢必要擁有足夠的威望，藉以強化本身的利益與國家地位基礎。而強大的武力也是鎮壓中國內部的不滿或是威嚇分裂國土可能的工具。儘管中共目前以經濟的發展為主，軍事力量的追求卻也從未減緩。因此只要中國共產黨維持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加強軍事力量的步伐是不會停歇的。

在冷戰結束後，世界局勢主要朝向多極化和全球化的發展。但是，冷戰的思維依然存在，尤其是「霸權主義」和「強權主義」的概念，這是造成世界動盪的主要原因。而霸權主義和強權主義已由少數國家起而頂替。但是，中共更在意的是國際社會對自身的不公、不義行動，因此中共外長唐家璇在第 54 屆聯合國大會發表「國際新秩序的五個主張」，其中包括，第一主權平等、互不干涉內政，第二要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第三要

強化聯合國的作用，第四要豎立新的安全思維以強化國際間的穩定、五要改革國際經濟體制，促進各國的發展。

以上五點顯示出中共正極力為主權、人權、民主等爭議問題解套，而且特別著重於主權的獨立、集體安全、追求平等發展的機會，為中國大陸內部的經濟發展給予穩定的環境。

所以中國在這 20 年來的改革開放以及面對許多國際間的衝突等事務的同時，增強自身的實力是刻不容緩的事情。並且在任何情勢下，清楚認知的根本利益和力量，制定和實施符合國家原則和利益，實現國家戰略目標。捍衛中共的領導與黨的利益等同於維護國家利益，因此中共發展戰略也就是以強化中共的自主權，並無威脅世界的可能。

中共實踐的大國外交中，軍事戰略只是其中的一環，並且主要是為了維護國家利益，其核心價值來自於對安全的考量。國土擴張及侵略通常是屬於戰略情勢誤判下的產物，安全還是中共國家利益的最大要求。中共自認是一個和平的愛好者，並期盼在和平共處的五個原則下所有的爭議都可以政治協商化解紛爭，但這完全是單方面的認定。

第四節 本章結論

中共始終認定國家的核心利益構成主要是以安全和發展兩個基本要素。安全是國家基本的保障，發展是國家的根本利益，因而採行的政策多以兩者為前提。所以，中共論及國家的保障時，經常伴隨著武力的問題，遂也成為窮兵黷武的國際形象。

社會主義國家主要將國家的利益放在人民之前，卻也容易造成國家利益成為政黨利益的情形。當中共以民族大義為號召時，很容易將安全與戰爭相提並論。其實在大國外交的處理上，這樣的觀念確實不適當，最終將導致實際利益與仇恨相結合。

近代的中國政治常常必須權衡根本利益的內容。在戰爭期間，國家利益的判斷不會是問題，整個社會都是一至對外。但在和平時期，人們對形勢的認知不同，也對國家利益的判斷產生不同見解，某些突發事件也會進一步造成認知上的差異。

利益的判斷與國際、國內情勢有直接的關係。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上，多次對戰略形勢的誤判導致失敗。過去認為"天下大亂"、"山雨欲來風滿樓"、"狼來了"，所以有預備"準備大打、早打，既準備打常規戰爭，也準備打核大戰"的戰略方針，結果是當東亞地區很多國家正準備經濟起飛時，中國卻必須處理"備戰、備荒、為人民"。問題在於當時的戰略判斷與當時的歷史條件並不完全成熟，人們沒有充分意識到核子武器的出現使得美蘇不得草率行動。此外，中國對國際情勢所做的誤判並未隨著國際戰略形勢的變化及時調整自己的腳步，喪失了很多寶貴的發展機會。

誤判情勢是軍事戰略運用的最大失誤，不僅浪費資源，甚至犧牲友邦國家的信任。因此中共現在與世界各國努力交好，不論是軍事上的收斂或是外交態度上的謙卑，都是避免誤判情勢的措施。